

拜登政府时期 欧洲在中美博弈中的 角色、基轴与变量^{*}

顾 强 何立强

摘 要: 在特朗普政府出台一系列针对中国的政策之后,中美关系已不可逆地走到了新的历史阶段,拜登政府的上台也不会改变此趋势。对于中国而言,在考虑拜登政府时期的中美博弈之时,不仅要深刻洞察美国的政策反应,也要注意第三方(特别是欧洲)所扮演的角色和政策选择。在拜登政府时期,在中美博弈的过程中欧洲的重要性将进一步凸显出来。从现有情况来看,拜登政府时期欧洲在中美博弈中的角色,既是博弈的“棋盘”,也是拥有相当大主动权并尽可能掌握自身命运的“棋手”。欧洲面对中美博弈时的政策基轴中,维持战略自主是核心政策目标,维护欧洲团结是政策基础,“混合方式”是政策手段。拜登政府的上台使欧洲对中美博弈的政策产生一定影响,成为中短期变量,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欧洲对战略自主的维护和实施能力;拜登政府对美欧关系的协调能力;中国对外部环境的反向塑造能力和方式。

关键词: 拜登政府; 中美博弈; 欧洲

作者简介: 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副教授 博士 广西 530004
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硕士研究生 广西 530004

中图分类号: D8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4871(2021)03-0062-17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东盟国家对中美战略竞争的认知与政策选择研究”(编号:20XJ01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感谢《德国研究》编辑部对本文提出的宝贵意见和修改建议,文中错漏之处由笔者负责。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中美迅速走向对立。拜登政府上台之后,中美关系在整体上依然持续恶化。在国际关系中的绝大多数情况下,双边关系会不可避免地受第三方因素的影响。第三方的角色与政策选择,对中美博弈的结果起关键性甚至决定性影响。对于中国而言,在考虑拜登政府时期的中美博弈之时,不仅要深刻洞察美国的政策反应,也要注意第三方扮演的角色和政策选择。唯有如此,才能尽可能地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在中美博弈的过程中,无论从经济体量、综合实力还是影响力来看,欧洲无疑都是影响最为重大的第三方力量。^①因此,研究拜登政府时期欧洲在中美博弈中的角色、政策基轴以及政策变量,具有特殊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拜登政府时期欧洲在中美博弈中的角色“棋盘”+“棋手”

在特朗普政府时期,欧洲已经变成了中美两国努力争夺的对象,俨然成为中美博弈的主要战场。特别是是否应该采用华为5G设备的问题成为斗争的焦点。可以预见,在拜登政府时期,在中美博弈的过程中,欧洲的重要性将进一步凸显。从现有情况来看,拜登政府时期欧洲在中美博弈中的角色,既是“棋盘”,也是“棋手”。这可从战略实力以及战略定位两方面体现出来。

(一) 战略实力: 中美必争且最重要的第三方

在战略实力方面,欧洲是中美皆高度重视且必争之地,同时欧洲强大的综合实力以及独特的外交方式使之能够掌握自身命运。具体而言,表现在三个方面。

1. 欧洲强大的综合实力

在经济方面,英国退出之后的欧盟27国的经济总量与中国和美国相差无几,基本处于同一量级。在科技方面,欧洲拥有大量高科技企业,特别是在绿色技术标准的制定方面掌握巨大优势,在新一轮科技浪潮中与中美两国基本处于同一梯队。在政治方面,其独特的软实力影响着世界各地。欧盟作为具有超国家性质的独特实体,向世界提供了一种平衡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全新区域性模式,充分展现了带有鲜明欧洲色彩的规范性力量与协调发展思维。在欧盟的积极对外输出宣传下,欧洲逐渐成为中等国家在保障自身利益前提下融入全球化浪潮的成功范例,其自身也一度成为“强大”“和平”与“繁荣”的象征,这为欧洲积攒了丰厚的软实力。欧洲正是由于综合实力与中美两强比较接近,在某些领域甚至超过中美两国,所以能够比较从容地掌握自身命运并表现出基本的独立性。

欧洲理事会主席夏尔·米歇尔(Charles Michel)表示“欧盟和美国,我们之间

^① 本文所言之欧洲是指现在的欧盟及其成员国,故并不包括已经脱欧的英国,也不包括地理上属于欧洲的非欧盟国家。

有分歧,它们不会神奇地消失。美国似乎变了,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对它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同样,美国对欧盟的看法也必须改变。欧盟选择了自己的路线,即不必获得他国的允许而自行决策。”^①这反映出,欧洲领导人对欧洲的综合实力有足够的信心。美国大西洋理事会题为《人工智能、中国以及全球对数字主权的追求》的报告称“欧盟在布鲁塞尔和柏林圆桌会议上详细讨论的一个方案是,欧洲可充当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桥梁,以某种方式缓解日益加剧的竞争。”^②这侧面说明,欧洲不但能够掌握自身命运,还能够展现出一定的独立性并进一步成为中美之间的桥梁。

2. 中美皆视欧洲为重点争夺对象

从政治、经济以及技术等方面看,欧洲在客观上已成为中美两国争夺的重点乃至焦点,这在华为5G问题上体现得淋漓尽致。特朗普政府后期,已表现出努力修复美欧关系以争夺欧洲之意,时任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和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Robert O'Brien)在2020年屡次出访欧洲。拜登政府上台前,无论是拜登总统本人还是政府要员,都曾多次表示要修复美欧关系。从拜登上台后半年的外交行动能够看出,修复美欧关系是其首要任务。拜登的首次外交亮相是参加慕尼黑安全会议,接着参加欧盟27个成员国的线上会议。拜登的首次外交出访,就是到欧洲参加与七国集团、欧盟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伙伴举行的峰会。拜登出访之前更是发表了题为《我的欧洲之行是为了让美国团结全世界的民主国家》的文章以在心理上拉近欧洲。^③新上任的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无论是电话外交还是出访,都以欧洲为首要目标,甚至在首次访问欧洲时表示“我认为可以这么说,美国在世界上没有比德国更好的朋友和伙伴。”^④这足以反映出拜登政府对欧洲的重视程度以及投入的外交资源。与之相应,中国同样为稳定中欧关系投入相当程度的外交资源。例如,在2020年和2021年,习近平主席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共进行了十次通话,习近平

① European Council/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Speech by President Charles Michel at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on the Inauguration of the New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2021-01-20,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ress/press-releases/2021/01/20/speech-by-president-charles-michel-at-the-european-parliament-on-the-inauguration-of-the-new-president-of-the-united-states/>, 访问日期: 2021-02-21.

② Matthew Burrows/Julian Mueller-Kaler, “AI, China, and the Global Quest for Digital Sovereignty”, 2021-01-13,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wp-content/uploads/2021/01/Smart-Partnerships-2021-Report-1.pdf>, 访问日期: 2021-01-22.

③ Joe Biden, “My Trip to Europe is about America Rallying the World’s Democracies”, 2021-06-06,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2021/06/05/joe-biden-europe-trip-agenda/>, 访问日期: 2021-06-08.

④ Laurenz Gehrke, “Blinken: US Has ‘No Better Friend in the World than Germany’”, 2021-06-23,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united-states-no-better-friend-than-germany-us-ally/>, 访问日期: 2021-06-26.

主席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共进行了七次通话。

3. 欧洲外交特殊且强大的规范性力量

因军事实力不足和决策体制的约束,欧洲发展出了极为特殊且强大的规范性力量。从现有情况来看,欧洲在应对中美博弈之时,就表现出积极运用规范性力量的态势。2020年10月10日,德法意等国学者与其他D10国家(即所谓“民主十国”)学者提出,为应对中国的挑战要“建立新的机构,以促进欧洲、印度-太平洋和全球志同道合的盟友和伙伴之间的合作。”与中国交往的基础是,“在共同利益之前加强合作并将中国纳入基于规则的体系”。^①对于与中国的贸易纠纷,欧洲提出应通过改革世贸组织以规范中国的行为。^②在应对中美科技之争时,欧洲更是很好地使用其规范性力量予以应对。在高新科技方面,欧洲与中美相比已略显颓势,但在制定技术标准方面明显走在中美之前。欧洲利用其在舆论、法律、规则等方面的优势,设法把公平、多元、人权、隐私等理念植入高科技的标准当中。“从《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到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纷纷启动数据税,以及为推进针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而讨论实施碳关税,都反映出欧盟利用其‘规范性力量’和市场规模,强势为全球相关产业制定标准所作出的努力。当前,欧盟针对美国数据企业巨头采取的一系列反垄断举措,已彰显出其市场规模的‘规范’效应。”^③在应对中美博弈的过程中,预计规范性力量将发挥非常突出的作用。从逻辑上来看,由于其权力来源不同于中美两国,所以其目标和举措也将有别于中美两国。正因如此,中美才得以可能争取欧洲,欧洲也将努力保持自身的独特性。

(二) 战略定位: 成为掌握自身命运的“棋手”

在战略定位方面,欧洲官员和智库做了相应阐述,主要表达了三方面的定位。

定位一是欧洲将深受中美博弈影响,成为中美争夺的对象,欧洲应避免成为中美博弈的牺牲品或成为国际舞台的配角。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中美关系的变化

^① Matthew Kroenig/Jeffrey Cimmina “Global Strategy 2021: An Allied Strategy for China”, 2020-12-10,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wp-content/uploads/2020/12/Global-Strategy-2021-An-Allied-Strategy-for-China.pdf>, 访问日期: 2020-12-14.

^② Anthony Dworkin “Europe’s Fight for Multilateralism: With or Without the US?”, 2020-10-21, https://www.ecfr.eu/article/commentary_europes_fight_for_multilateralism_with_or_without_the_us, 访问日期: 2020-11-02.

^③ 金玲《欧盟作为“规范性力量”面临的挑战及前景》,载《世界知识》,2020年第9期,第25-30页,这里第30页。

让欧盟领导人意识到,“COVID-19使下一个世界已经来临”。^①如托马斯·戈马尔(Thomas Gomart)所形容“无论如何,在美国和中国的桅杆之间,欧洲是首选。”^②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在其题为《保护欧洲免受经济胁迫:2020年美国大选后的战略》的政策报告称“欧盟既是中美冲突的边缘,又是中美冲突的关键战场。一方面,这两个大国的战略重点是印度-太平洋地区,这意味着它们并不总是关注欧洲的事件,这可能损害欧洲在该地区的利益。另一方面,矛盾的是,欧洲市场是中美两国的关键战场。”^③这说明,欧洲清楚中美很可能将其变成博弈的场所,必须在此过程中保护自身利益,避免成为中美博弈的牺牲品或在国际舞台上沦为配角。

定位二是欧洲不愿成为“棋盘”,而要成为“棋手”。在中美博弈逐渐成形过程中,欧洲已表达出在中美博弈过程中要掌握自身命运的强烈愿望。托尔斯滕·本纳(Thorsten Benner)表示“欧洲正在慢慢但肯定地认识到,美中之间的竞争将是本世纪决定性的地缘政治挑战。欧洲不能成为大国博弈的‘棋盘’,而必须成为我们自己的‘棋子’,有自己的战略。”^④从欧洲官员和智库的主观定位来看,欧洲一方面认识到自身深受中美博弈的影响且很可能已经成为博弈的场所,另一方面力争能够紧紧地掌握自身命运,避免成为中国或美国的附庸。欧洲的战略定位,从其在拜登政府上台前后的表述来看,并无明显变化。因此,德国外长海科·马斯(Heiko Maas)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发表演讲时,在极力呼吁重建跨大西洋关系以及热情赞扬双方共同的价值观之时,依然没有表达在中美博弈过程中要选边站的意向。^⑤

定位三是欧洲要成为中美之外的第三支柱。在中美博弈的过程中,欧洲与其他第三方一样,都不希望成为博弈的场所,更不希望被中国或美国摆布,而希望能够拥有一定程度的选择空间。与其他第三方不同,欧洲在自我定位方面更积极和

① Josep Borrell, “COVID-19: le monde d’après est déjà là 《COVID-19》”, 2020-06-04, <https://www.ifri.org/fr/publications/politique-etrangere/articles-de-politique-etrangere/covid-19-monde-dapres-deja>, 访问日期: 2020-07-01.

② Thomas Gomart, “Le COVID-19 et la fin de l’innocence technologique”, 2020-06-08, <https://www.ifri.org/fr/publications/politique-etrangere/articles-de-politique-etrangere/covid-19-fin-de-linnocence>, 访问日期: 2020-07-02.

③ Jonathan Hackenbroich, “Protecting Europe from Economic Coercion: Strategy after the 2020 US Election”, 2020-12-09, <https://ecfr.eu/article/protecting-europe-from-economic-coercion-strategy-after-the-2020-us-election/>, 访问日期: 2020-12-14.

④ Körber-Stiftung, “Chessboard or Player? The EU Role in US-China Competition: An Interview with Thorsten Benner and Torrey Taussig”, 2019-11-26, <https://thediplomat.com/2019/11/chessboard-or-player-the-eu-role-in-us-china-competition/>, 访问日期: 2020-06-11.

⑤ Federal Foreign Office, “Speech by Foreign Minister Heiko Maas on the Occasion of the Inauguration of the Fritz Stern Chair at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21-09-03, <https://www.auswaertiges-amt.de/en/newsroom/news/-/2446636>, 访问日期: 2021-09-12.

主动,希望欧洲“在由中美两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中,成为中立但并非等距的第三支柱。”^①汉斯·昆德纳尼(Hans Kundnani)研究后发现,许多欧洲人期望“欧洲能够像中国和美国一样强大,成为多极世界中的第三极。”^②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何塞·博雷利(Jose Borrell)提出“这是一个地缘战略竞争的世界,一些领导人对使用武力毫无顾忌,经济和其他手段被武器化。为了避免在当今的美中竞争中成为输家,我们必须重新学习权力的语言,并将欧洲视为顶级地缘战略参与者。”^③为实现此目标,欧洲智库提出需要加强与中美之外国家的合作。法国国际关系研究院的政策报告提出“面对中美竞争,欧洲需要联合以自强,同时与中美之外的国家合作,组成中美之外的强大力量,避免受制于中美两国。”^④沿此思路,能够看到2021年上半年欧洲非常积极地推动与印度、澳大利亚、日本、东盟等国的对话与合作。在阿富汗危机爆发之后,欧洲的危机感暴增,预计欧洲将更加坚定地认为自己需要成为中美之外的第三支柱。法国财长布鲁诺·勒梅尔(Bruno Le Maire)就明确提出“欧洲必须成为中美之外的第三个超级强权(Super Power)。”^⑤

从上述分析可见,欧洲主观上并不想成为中美博弈的“棋盘”,而想成为掌握自己命运的“棋手”。但是,客观现实决定了,欧洲不可避免地将成为中美争夺的重点,成为博弈的重要战场。同时,欧洲强大的综合实力,特别是其发展出来的规范性力量,使之成为能够维护自身利益和相对独立的博弈者。可以推断,在拜登政府时期,欧洲在中美博弈中的角色和定位不会发生明显变化。

二、拜登政府时期欧洲对中美博弈的政策基轴

经历了过去两年的激烈博弈,中美关系的框架已基本定型,不会因美国领导人的更迭而发生明显变化。与之相应,欧洲对中美博弈的政策基轴也已显露,将成为欧洲的长期政策,在拜登政府时期亦然。面对中美博弈,欧洲的政策基轴可从政策目标、政策基础以及政策手段三方面推导和总结。对于政策目标,维持战略自主是

① Pepijn Bergsen “The EU’s Unsustainable China Strategy”, 2021-07-09, <https://www.chathamhouse.org/2021/07/eus-unsustainable-china-strategy>, 访问日期: 2021-08-12.

② Hans Kundnani “Europe’s Sovereignty Conundrum”, 2020-05-13, <https://berlinpolicyjournal.com/europes-sovereignty-conundrum/>, 访问日期: 2021-06-02.

③ Josep Borrell “Embracing Europe’s Power”, 2020-02-08,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embracing-europe-s-power-by-josep-borrell-2020-02>, 访问日期: 2020-06-17.

④ Études de l’Ifri “L’Europe face à la rivalité sino-américaine : le coronavirus comme catalyseur”, 2020-05-12, <https://www.ifri.org/fr/publications/etudes-de-ifri/leurope-face-rivalite-sino-americaine-coronavirus-catalyseur>, 访问日期: 2020-07-26.

⑤ Francesca Landini “Afghanistan a Wake-up Call for Europe on Defence, Leadership-France”, 2021-09-05,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europe-defence-france-idUSL8N2Q60A4>, 访问日期: 2021-09-08.

欧洲的核心目标。对于政策基础,维护欧洲团结将成为其必要条件。对于政策手段,“混合方式”将成为欧洲的首选。

(一) 政策目标: 维持战略自主

1. 战略自主的提出与维持

欧盟自20世纪90年代末推出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一直努力发展独立军事行动能力。受特朗普政府冲击,战略自主被法国总统马克龙重新提出,也被许多欧洲领导人视为欧洲外交与安全政策目标。欧洲也逐渐认识到在中美博弈过程中,自身需要努力维持战略自主。德国科学与政治基金会(SWP)就提出“欧洲需要逃脱要求在美国和中国经济、技术领域之间进行选择的两极逻辑,欧盟必须制定中国政策以实现战略自主。”^①

从过去的实践来看,欧洲推行战略自主成效明显不如人意。在拜登赢得大选前后,因对拜登政府存在比较“天真”的想法,^②质疑战略自主之声浮现。对此,许多欧洲政治家坚持认为,为欧洲的长远发展考虑需要继续推行战略自主。在美国总统大选前,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报告提出:“欧洲人不应该对美国抱有幻想。最终,美国在欧洲的参与程度是由华盛顿决定,而不是由华沙、巴黎或柏林决定。”^③在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塑造一个更加团结、强大、自主的欧洲依然是欧盟的主要任务”。^④此后欧洲的主要领导人更是多次表示要坚持战略自主。在阿富汗危机和澳大利亚“潜艇事件”(下文简称“潜艇事件”)的双重重击之下,欧洲进一步强化战略自主意识。“潜艇事件”爆发后,法国外长和防长在其联合声明中明确强调这“只会更加需要大声且明确地提出欧洲战略自主问题”。^⑤从拜登政府上台后欧洲所推行的多项政策来看,欧洲会坚持推动战略自主,虽然在此过程中会遇到诸多阻力,但趋势已难扭转。

^① Barbara Lippert/Volker Perthes (eds.), “Strategic Rivalry between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2020-04-20, https://www.swp-berlin.org/fileadmin/contents/products/research_papers/2020RP04_China_USA.pdf, 访问日期: 2020-04-21.

^② Rick Noack, “Macron Says Europeans Need to Stop Being Naive and Assert Independenc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2021-09-28,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europe/macron-us-independence/2021/09/28/5d900056-205d-11ec-a8d9-0827a2a4b915_story.html, 访问日期: 2021-09-30.

^③ Jana Puglierin, “Touching the Elephant: European Views of the Transatlantic Relationship”, 2020-09-28, https://ecfr.eu/article/commentary_touching_the_elephant_european_views_of_the_transatlantic_relati/, 访问日期: 2020-09-30.

^④ 郑春荣、倪晓姗《历史演进视角下的欧盟与北约关系走向——兼析拜登当选的影响》,载《国际展望》,2021年第2期,第45-64页,这里第62页。

^⑤ Ministère de l'Europe et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Joint communiqué issued by Jean-Yves Le Drian and Florence Parly”, 2021-09-16, <https://www.diplomatie.gouv.fr/en/country-files/australia/news/article/joint-communique-issued-by-jean-yves-le-drian-and-florence-parly-16-sept-2021>, 访问日期: 2021-09-17.

2. 战略自主的细化

自战略自主提出以来,其具体内容就不断地进行细化和深化,至今已衍生出“战略主权”“经济主权”“技术主权”和“数字主权”等概念。首先,是“战略主权”。欧洲议会把“战略主权”定义为能够自主行动、在关键的战略领域运用自身的资源且在必要时与伙伴进行合作以实现其目标的能力。^①其次,是“经济主权”。从欧洲政界和学者的讨论看,欧洲“经济主权”包括贸易、金融和产业等领域。欧洲“经济主权”的目标是使欧洲能够在经济上摆脱对其他国家的依赖,通过“自主”选择,最大程度维护欧洲经济利益并免受外界威胁和胁迫。为推进“经济主权”,避免受到美国的金融制裁,在拜登正式就任前的2021年1月15日,欧盟委员会公布政策草案,呼吁欧盟团结各成员国寻求防范欧洲易受制裁和其他金融风险影响的途径。^②随后,欧盟委员会宣布,欧洲市场参与者应减少使用欧盟以外的清算所,并与欧盟27国内部的清算所开展更多合作。^③第三,是“技术主权”。聚焦到科技领域,欧洲“技术主权”的诉求是“欧洲是否独立地具有对技术发展和运用的控制能力。”其手段是创造正确的环境条件,“让欧洲去发展部署自己的关键能力,从而减少欧洲对全球其他地区关键技术的依赖”。^④2021年最典型的政策体现在半导体市场,为实现关键技术自主可控,避免被美国技术“卡脖子”,欧洲多次出台政策扶持半导体并为此投入巨资。第四,是“数字主权”。“数字主权”与“技术主权”有所关联,其目标是在数字化浪潮中实现欧洲在数字世界的自主行动,促进欧洲的数字创新。重点关注非欧洲科技公司的影响力,特别是保护欧洲的数字经济、创新潜力、个人隐私、数据存储以及数字基础设施的安全,并为此加强对非欧洲科技公司的监管和审查。

从现有情况看,维持战略自主仍是欧洲外交与安全政策的长期目标。面对中美博弈,维持战略自主同样是欧洲的核心目标。在中短期内欧洲的战略自主会面临一定的阻力,在拜登政府时期欧洲内部也会出现反对之声,但长期看维持战略自主仍是欧洲前进的方向。

(二) 政策基础: 维护欧洲团结

^① European Parliament “Strategic Sovereignty for Europe”, 2020-09-16,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BRIE/2020/652069/EPRS_BRI\(2020\)_652069_EN.pdf](https://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BRIE/2020/652069/EPRS_BRI(2020)_652069_EN.pdf), 访问日期: 2021-09-28.

^② Jim Brunsten/Sam Fleming “EU Sets out Plans to Curb Reliance on Dollar in Post-Trump era”, 2021-01-16, <https://www.ft.com/content/20f39e33-e360-479e-82e2-5441d24f0e0b>, 访问日期: 2021-02-21.

^③ Karen Yeung “As US Economic Clout Diminishes, China and Europe Work to Cut Dollar Reliance”, 2021-01-22, <https://www.scmp.com/economy/global-economy/article/3118852/us-economic-clout-diminishes-china-and-europe-work-cut>, 访问日期: 2021-01-25.

^④ 洪延青、朱玲凤、张朝、谢晨曦《欧盟提出“技术主权”概念 引领欧盟数字化转型战略》,载《中国信息安全》,2020年第3期,第70-74页,这里第71页。

在欧盟的27个成员国中,单个成员国的国际影响力都比较有限,特别是面对中美两国,任何单一欧洲国家都不具有与之相比的综合实力。与此同时,以集体出现的欧盟,则是任何国家都无法忽略的存在。因此,团结对于欧洲而言尤其重要,也成为其内外政策的基础,面对中美博弈尤其如此。博雷利表示,欧洲必须“一步一步地团结起来。……如果我们没有这种内部团结,很明显我们不会成为一个强大的战略参与者”。^①德国总理默克尔曾言:“欧盟只有加强团结才会强大。”^②德国联邦政府公布的《担任轮值主席国工作纲要》中的口号是“共同努力:让欧洲再次强大”。^③法国国际关系研究院的政策报告也提出:“欧洲面对中美竞争,欧洲需要联合以自强。”^④

面对美国,欧洲越来越多地强调团结应对,在拜登政府时期亦然。拜登胜选后,欧洲迄今已采取多项联合行动。“潜艇事件”爆发后,欧盟以比较一致的声音向美国发声,并强调欧洲团结。德国欧洲事务部部长迈克尔·罗斯(Michael Roth)就表示:“法国与美国的外交危机是‘对我们所有人的警钟’,此事将使一个经常在外交与安全政策上存在分歧的欧盟进一步团结。”^⑤博雷利表示,欧盟各国外长对法国进行“声援”,“外长们明确表示与法国保持团结。”^⑥面对中国时,欧洲同样强调团结应对。欧洲团结应对中国之意,近三年表现得日益明显。对于中国有意在北欧和南欧推行次区域合作的意向,欧盟非常关切,欧盟驻华使团多次公开呼吁中国减少在欧洲的次区域合作以免影响欧盟内部团结。对于中国与中东欧的“17+1合作”机制,欧盟和德法等国担心中国利用此机制分化欧洲,乃至对欧洲“分而治之”。为防止中国通过分而治之的方式来分化欧洲,欧洲领导人多次表示要团结应对中国。随着最近两年中国和匈牙利在政府层面关系日趋紧密,欧洲防范中国对其进行分化并呼吁团结应对中国的声音进一步高涨。凡此种种,都表明欧洲要团结以应对中美战略竞争所带来的挑战。

(三) 政策手段: 混合方式

① Ishaan Tharoor: “E. U. to Trump ‘We are Not Foes’”, 2020-02-10,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2020/02/10/eu-trump-we-are-not-foes/>, 访问日期: 2020-02-21.

② 姚慧《法德首脑会晤展示欧洲团结》,《人民日报(海外版)》,2020年8月25日,第10版。

③ “Focus Areas Agreed: Programme for Germany’s Presidency of the Council of the EU in Place”, 2020-06-24, <https://www.eu2020.de/eu2020-en/news/article/-/2357724>, 访问日期: 2020-07-02.

④ Études de l’Ifri “L’Europe face à la rivalité sino-américaine: le coronavirus comme catalyseur.”

⑤ “Macron and Modi Vow to ‘Act Jointly’ in Indo-Pacific as Submarine Row Intensifies”, 2021-09-21, <https://www.france24.com/en/asia-pacific/20210921-macron-and-modi-vow-to-act-jointly-in-indo-pacific-as-submarine-row-intensifies>, 访问日期: 2021-09-22.

⑥ Michelle Nichols “EU Backs France in Submarine Dispute, Asking: Is America Back?”, 2021-09-20, <https://www.reuters.com/world/europe/eu-foreign-ministers-discuss-submarine-dispute-monday-2021-09-20/>, 访问日期: 2021-09-22.

阿里·韦恩(Ali Wyne) 在分析第三国应对中美博弈所采取的政策和立场之后总结提出“第三国会继续采用‘混合方式’(Hybrid Approach) 来平衡处理同美国与中国的关系。”^①“混合方式”即第三方国家拒绝一边倒地在中美之间选边站,而是针对具体问题作出决定,在某些问题上选择支持中国,在某些问题上会更靠近美国。甚至,在同一问题中的不同议题上,会分别支持不同国家。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问题上,某些国家在调查所谓“新冠病毒起源”方面支持美国,而在反对“病毒溯源政治化”方面支持中国,这是“混合方式”的具体体现。从现有情况看,“混合方式”已成为多数第三方国家面对中美博弈时的首选。可以预见,拜登政府时期“混合方式”将继续成为欧洲的首选,这可从逻辑与实践两方面来考察。

在逻辑层面,中美虽在部分领域已明显“脱钩”,但不可能完全“脱钩”。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何瑞恩(Ryan Hass) 经过分析后发现,最近几年中美虽然竞争加剧,但相互依赖程度却在加深。“美中两国之间由贸易、金融、科技以及学术联系所构建起来的密集网络,已经使一方难以在不伤害自身的情况下伤害对方。”^②拜登政府贸易代表戴琪(Katherine Tai) 也认为中美贸易“脱钩”并不现实,并提出中美可能寻求某种“再挂钩”。^③正因中美无法完全“脱钩”,中美关系也将明显有别于冷战时期鲜有来往和交集的美苏关系,所以学者们把中美博弈概括为“混合战”。德米特里·特列宁(Dmitri Trenin) 总结“美中之间的摩擦确实是一场影响很深远的冲突,但与美苏冷战的情况存在明显差异。在此,我更愿意使用‘混合战’一词描述美中目前的对立。”^④朴喆熙提出“拜登政府可能采取‘混合战略’,即在可能合作的领域合作,在无法避免竞争的领域则寸步不让。”^⑤从逻辑上看,因中美博弈是“混合战”,不可避免地影响到第三方的政策和立场,使之选择“混合方式”予以应对。因此,“混合方式”将成为第三方面对中美博弈时的首选。

从实践状况看,欧洲在面对中美博弈时明确拒绝选边站,为“混合方式”的实施留下了空间。在官方层面,欧洲主要领导人已经多次表示拒绝选边站,而拜登政

^① Ali Wyne, “How to Think about Potentially Decoupling from China”,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43, No. 1, 2020, pp. 41 – 64, here p. 49.

^② Ryan Hass, “The ‘New Normal’ in US-China Relations: Hardening Competition and Deep Interdependence”, 2021 – 08 – 12,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order-from-chaos/2021/08/12/the-new-normal-in-us-china-relations-hardening-competition-and-deep-interdependence/>, 访问日期: 2021 – 08 – 15.

^③ “A Conversation with Ambassador Katherine Tai, U. S. Trade Representative”, 2021 – 10 – 04, <https://www.csis.org/events/conversation-ambassador-katherine-tai-us-trade-representative>, 访问日期: 2021 – 10 – 05.

^④ ドミトリー・トレニン氏《「新冷戦」と異なる米中対立》, 2020 – 10 – 22, <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KZ065278170R21C20A0TCT000/>, 访问日期: 2020 – 10 – 25.

^⑤ 樸喆熙: 《トランプ以後の東アジア》, 2020 – 12 – 06, <https://www.tokyo-np.co.jp/article/72776>, 访问日期: 2020 – 12 – 15.

府也已经多次表示不寻求进行新冷战,也不要求其他国家选边站。在很大程度上,这是拜登政府无奈的选择。在普通民众层面,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所发布的调查显示,多数欧洲人“希望他们的国家在美国与俄罗斯或中国之间的冲突中保持中立,而不是与华盛顿保持一致”。^①这说明,拒绝选边站具有相当程度的社会基础,这为欧洲决策者运作“混合方式”留下了相当程度的空间。因此,能够看到拜登政府上台之后,欧洲在价值观领域与美国联手对中国进行施压,在技术领域提升对中国的防范和限制,在贸易领域双边贸易额继续攀升,在投资领域欧洲企业继续看好中国市场。中国欧盟商会“2020年商业信心调查”显示,89%的欧洲企业都没有计划撤离中国,考虑撤离的只占11%,低于2019年比例。^②在气候变化和阿富汗问题上,提倡与中国进行合作。这是“混合方式”的具体体现。

三、拜登政府时期欧洲对中美博弈的政策变量

从长期看,面对中美博弈,欧洲会坚持其政策基轴。从中短期看,拜登政府上台后出现的新形势使欧洲对中美博弈的政策产生一定影响,成为重要变量。这当中包括欧洲内部和外部两方面的变量,而外部变量又包括来自中国以及美国的变量。因此,在中短期内变量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变量一源于欧洲自身,其核心是欧洲对战略自主的维护和实施能力;变量二来自美国,主要是拜登政府对美欧关系的协调能力;变量三来自中国,主要是中国对外部环境的反向塑造能力和方式。

(一) 变量一: 拜登政府时期欧洲战略自主的维护与实施能力

在中美博弈的过程中,欧洲能否如其所愿成为中立但并非等距的第三支柱,核心是其能否坚持和实施战略自主。如前文所述,从长期来看维持战略自主仍是欧洲前进的方向,但在拜登政府时期面临着挑战,将成为影响欧洲对中美博弈的内部变量。

一是欧洲主要领导人的更迭将使其在短期内存在一定程度的政策不确定性。领导人更迭最大的不确定性,无疑是在2021年9月德国举行大选并组成新政府之后默克尔的离任。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后,默克尔事实上成为欧洲的政治领袖,其政治资本、个人才干和感召力在德国政坛乃至欧洲都难以替代。德国新总理的政治资本和政治经验皆无法与默克尔相提并论。继任总理以及外长对欧洲战略自

^① Ivan Krastev/Mark Leonard “The Crisis of American Power: How Europeans See Biden’s America”, 2021-01-19, <https://ecfr.eu/publication/the-crisis-of-american-power-how-europeans-see-bidens-america/>, 访问日期: 2021-01-21.

^② Yukon Huang/Jeremy Smith “Why US-China Supply Chain Decoupling Will be More of a Whimper than a Bang”, 2020-06-30, <https://www.scmp.com/comment/opinion/article/3090900/why-us-china-supply-chain-decoupling-will-be-more-whimper-bang>, 访问日期: 2020-07-05.

主的态度就尤其关键。2022年4月法国将举行总统选举,届时如作为欧洲战略自主最坚定推动者的马克龙败选,法国固然不会改变战略自主的方向,但其具体政策和执行将引发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

二是欧洲内部各思潮的涌动,拖拽着欧洲往不同方向发展。就自由主义而言,新冠肺炎疫情的逐渐消散以及拜登政府上台,将有助于自由主义的回潮。就民粹主义而言,民粹主义在欧洲已经泛滥成灾,其所催生的经济保护主义,无论对中国还是美国,乃至欧洲一体化,都将是重大挑战。就国家干预主义而言,受疫情以及中美竞争而受到重大鼓舞的国家干预主义,将在欧洲强势崛起,在政府扶持政策的影响下,法国过去三年估值超过10亿欧元的“独角兽”企业在数量上就增长了两倍。^①可以预见,在后疫情时代,国家干预主义将会在欧洲的经济活动中强势崛起。不同思潮的拖拽,将会在经济和社会两个层面影响欧洲战略自主的发展方向。

三是中东欧国家对战略自主的反应,在短期内将成为欧洲战略自主的消极因素。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其对东欧的态度就明显有别于对法德的态度,对前者的态度明显更为积极和正面,最明显的是实施重返中东欧的政策。“美国重返中东欧导致中东欧地区地缘政治竞争异常激烈,中东欧国家采取包括追随、制衡和对冲等差异性战略选择,不仅影响了欧盟内部权力关系和跨大西洋纽带关系,还从安全、经济和规范价值层面弱化了欧盟战略自主。”^②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出于对美国安全保护伞的依赖,中东欧国家进一步靠近美国,在短期内助长了对欧洲战略自主的质疑之声。甚至,在阿富汗危机爆发后,面对要求欧盟采取更多实质性举措以提升欧洲自主防务能力的呼声,中东欧国家依然消极以对。^③

四是欧盟决策机制的改革,在技术层面影响欧洲战略自主的制定和实施。长期以来,欧盟在外交政策方面需要欧盟27个成员国一致通过,而部分成员国一旦投否决票,许多决议就无法通过。因此欧盟在外交方面就经常出现“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困境。预计在2022年,欧盟将对其决策机制进行改革,限制一票否决权。从欧盟善于妥协的政治文化来看,只要德法两大国坚持推行欧洲战略自主,欧盟就仍然会沿此方向前行。与此同时,欧盟决策机制的改革,至少在技术层面将影响欧洲战略自主的制定和实施,使之产生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

(二) 变量二: 拜登政府对美欧关系的协调能力

^① Peggy Hollinger, “French Tech Bet Pays Off with Rise in ‘Unicorns’”, 2021-07-18, <https://www.ft.com/content/3db2b2a9-4d19-4928-91e0-d2e48c635482>, 访问日期: 2021-07-25.

^② 贺之杲《美国重返中东欧对欧盟战略自主的影响》,载《德国研究》,2020年第3期,第52-70页,这里第52页。

^③ 杨忠洁《阻力重重,欧盟防务自主难》,载《中国国防报》,2021年9月8日,第4版。

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美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除最近因“潜艇事件”受到较大影响的法美关系之外,总体来看美欧关系已经明显改善。与此同时,拜登政府对美欧关系的协调能力将面临诸多挑战,这将成为影响拜登政府时期欧洲对中美博弈的政策变量。

1. 拜登政府使美欧关系获得重构

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美欧关系获得重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重建价值观联盟。与特朗普政府弱化价值观因素不同,拜登政府极力强调价值观的重要性。拜登政府的《过渡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指南》提出“我们必须与志同道合的盟友和伙伴一道振兴世界各地的民主。我们将召开全球民主峰会,确保盟国和伙伴在我们最珍视的利益和价值观上进行广泛合作。”对于台湾、香港、新疆和西藏等问题,“在所有这些问题上,我们将努力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形成一种共同的做法”。^① 拜登举行其上任后首次记者会,重申召开一次民主峰会的计划。^② 美欧在此领域一拍即合,体现在具体问题上,美欧已联手向中国施压。其次,在安全问题上,停止向欧洲施压。特别是,暂停从德国撤军,对于军费开支比例问题,弱化向欧洲的施压程度。在拜登访问欧洲期间,双方更是联手重振北约。第三,拜登政府对欧洲作出相当程度的让步,以部分解决双方存在的实质问题。例如,停止与欧洲的贸易战,努力解决美国和欧洲长期存在的飞机补贴争端,使之可联合专注于更大的问题,包括中国新兴的飞机工业。^③ 放弃对“北溪2号”相关运营公司的制裁,^④ 以修复美德关系。第四,协调解决全球性问题,特别是公共卫生问题、气候问题和伊核问题。在拜登政府上台之前,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曾发表报告提出“华盛顿将寻求欧盟支持美国领导在印太地区应对中国的行动,同时也希望欧洲对东欧、中东和非洲的安全与稳定承担更多责任。作为交换,欧盟及其成员国应提出一项新的跨大西洋协议,其中涉及跨领域的全球性问题,例如卫生政策、贸易、安全、气候

① The White House, “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 2021-03-16,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1/03/NSC-1v2.pdf>, 访问日期: 2021-04-02.

②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in Press Conference”, 2021-03-25,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1/03/25/remarks-by-president-biden-in-press-conference/>, 访问日期: 2021-04-03.

③ Andrea Shalal/David Lawder, “Biden Trade Czar ‘Optimistic’ U. S. -EU Aircraft Subsidy Spat to End Soon”, 2021-05-27,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usa-trade-eu-aircraft/biden-trade-czar-tai-optimistic-u-s-eu-airline-subsidies-spat-may-end-soon-idUSKCN2D81PO>, 访问日期: 2021-05-29.

④ Hannibal Hanschke, “Nord Stream 2 Sanctions Would Be ‘Counter-Productive’ for European Ties — Biden”, 2021-05-26, <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energy/nord-stream-2-sanctions-would-be-counter-productive-european-ties-biden-2021-05-26/>, 访问日期: 2021-05-28.

变化和捍卫民主。”^①从拜登政府上台后美欧的协调来看,美欧很明显遵循了此思路,双方在全球性问题上进行了密切的协调。第五,在美欧关系重构的构架下协调对华政策。竞选期间拜登撰文称,“应对中国挑战最有效的方法是建立美国盟友和伙伴的统一战线。”^②在多重作用下,美欧对华政策协调已然开始。

2. 美欧关系重构面临诸多挑战

首先,美国战略调整引发结构性困境。美国要集中力量与中国竞争,就需在其他地区进行战略收缩,特别是把中东和欧洲的战略资源转向印太地区,这与欧洲的战略意图明显相悖。其次,美国希望降低其所承担的全球责任,由此势必引发国际公共产品的进一步缺失,这与欧洲的战略理念和战略利益相冲突。第三,美国国内政治的民粹化,使欧洲不得不警惕和预防特朗普主义(甚至特朗普本人)的卷土重来。默克尔向拜登致以“最热烈祝贺”的同时亦警告:“不要以为从明天起德美关系一切都会顺利。……德国与拜登并非将在所有问题上都保持一致。”^③拜登政府的许多政策明显有特朗普痕迹。如拜登政府对新冠疫苗的囤积和不公平分配显示“美国优先”仍是白宫的政策。^④第四,美式单边主义与欧式多边主义的冲突。拜登政府上台后虽然表示要回归多边主义,但是欧洲认为拜登的一些政策实质为“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是“美国优先”2.0版。^⑤“潜艇事件”爆发后,欧洲再次认识到,“单边主义不再像乔治·W·布什或特朗普时代被认为的那样是共和党人的专属领域,它已经成为美国今天行动的关键之一”。^⑥第五,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存在着明显的认知差异。如在对华贸易上,欧洲主要从经济角度思考且尽可能不

① Julien Barnes-Dacey/Susi Dennison/Anthony Dworkin/Ellie Geranmayeh/Mark Leonard/Theodore Murphy/Janka Oertel/Nicu Popescu/Tara Varma “A New Transatlantic Bargain: An Action Plan for Transformation, Not Restoration”, 2020-11-26, <https://ecfr.eu/wp-content/uploads/A-new-transatlantic-bargain-An-action-plan-for-transformation-not-restoration.pdf>, 访问日期: 2020-11-28.

② Joseph R. Biden “Why America Must Lead Again: Rescuing U. S. Foreign Policy After Trump”, 2020-01-23,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0-01-23/why-america-must-lead-again>, 访问日期: 2020-01-25.

③ “Behind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Warning’, It Is the General Doub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2021-01-23, <https://ycnews.com/behind-the-biden-administrations-warning-it-is-the-general-doubt-of-the-international-community/>, 访问日期: 2021-01-27.

④ David Meyer “America First is Back—and It’s Messing with the Global Rollout of Covid Vaccines”, 2021-03-15, <https://fortune.com/2021/03/15/us-should-stop-harming-vaccine-production-in-other-countries-ceo-daily/>, 访问日期: 2021-03-16.

⑤ Anthony Dworkin “Americans Before Allies: Biden’s Limited Multilateralism”, 2021-06-09, <https://ecfr.eu/article/americans-before-allies-bidens-limited-multilateralism/>, 访问日期: 2021-07-12.

⑥ Jean-Pierre Maulny “Rupture du contrat sur les sous-marins australiens : quelles conséquences pour l’industrie, française ?”, 2021-09-18, <https://www.iris-france.org/160439-rupture-du-contrat-sur-les-sous-marins-australiens-quelles-consequences-pour-lindustrie-francaise/>, 访问日期: 2021-09-20.

涉及安全问题,美国却将之视为地缘政治斗争的一部分。欧洲认为应改革世贸组织以限制中国,拜登政府则可能通过关税以及扭曲世贸组织的体制以抵消中国的经济优势。^① 第六,对于经济利益重要性的看法存在差异。美国为与中国进行竞争,不惜出台对自身经济利益损害甚大的政策,而欧洲则与之存在温差。“德国的外交政策侧重与盟友和竞争对手建立良好关系,以保护其经济所依赖的出口。”^② 欧洲在与美国协调对华政策的同时,也希望与中国保持合作,特别是在经济领域。

(三) 变量三: 中国对外部环境的反向塑造

一方面,中国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具备对外部环境的反向塑造能力。从历史来看,具有世界性影响力的大国对外部环境都具有相当程度的反向塑造作用。中国的崛起,更是积极地推动着国际体系由单极向多极发展。与此同时,无论是中美关系还是中欧关系,都已经不再被美国和欧洲单方面定义和决定。如著名学者时殷弘所言,“中美关系趋势颇大程度上可以由中国影响或者塑造”。^③ 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国在中美关系中的主动塑造能力越来越强”。^④ 袁鹏总结认为“中国推进更深层次改革和更高水平开放,让自身发展与人类前途命运融通,这本身就是塑造中美关系;在全球重大问题上,中国保持定力不搞本国优先,让各国看到中国是世界稳定和平的力量,这也是在塑造中美关系。此外,中国所拥有的必要的反制能力,也是对中美关系的一种塑造。”^⑤ 从过去将近一年半的时间来看,“面对美方发难,中方坚决捍卫国家利益,防止中美关系‘脱钩’,同时把握斗争节奏,争取中美关系转圜发展的空间。……中国将有能力主动塑造未来的中美关系。”^⑥ 中美关系是如此,中欧关系亦然。冯仲平认为,“当前是中欧关系一个重要的塑造期”。^⑦ 鉴于中国对于外部环境已经形成了相当程度的反向塑造能力,中国对包括中美关系和中欧关系在内的外部环境反向塑造能力的强弱以及塑造的方式,成为

① Anthony Dworkin “Europe’s Fight for Multilateralism: With or Without the US?”.

② Bojan Pancevski “Even Under New Leadership, Germany Won’t Confront China”, 2020-11-15, <https://www.wsj.com/articles/even-under-new-leadership-germany-wont-confront-china-11610723101>, 访问日期: 2020-11-26.

③ 时殷弘《未来中美关系怎么走? 可以由中国塑造》, 2020-12-01, https://www.guancha.cn/ShiYin-Hong/2020_12_01_573087.shtml, 访问日期: 2021-06-20.

④ 于潇清《中方连续两天发声: 框定中美关系, 加强主动塑造能力》, 2020-07-10,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8210051, 访问日期: 2021-06-21.

⑤ 袁鹏《高层战略对话在即, 中美关系向何处去?》, 2021-03-17, <http://www.chinanews.com/gn/2021/03-17/9434718.shtml>, 访问日期: 2021-06-21.

⑥ 马子倩、周呈宣《国研院发布新版中国外交蓝皮书: 中国将有能力主动塑造未来中美关系》, 2021-03-13, http://news.youth.cn/gj/202103/t20210313_12767219.htm, 访问日期: 2021-06-22.

⑦ 白云怡、王琪《中欧举行第十一轮战略对话, 专家: 首要议题仍是中欧双方对彼此关系的定位》, 2021-09-29, <https://m.huanqiu.com/article/44xZ1c846SK>, 访问日期: 2021-09-30.

影响拜登政府时期欧洲对中美博弈的重要变量。

另一方面,中国在四个方面进行反向塑造。首先,是利益塑造。中国作为世界上的第二大经济体,市场潜力巨大,已经能够利用自身的实力和优势塑造中国与他国之间密切的利益关系,特别是商业联系。在2020年,面对美国所推动的对华“脱钩”,中国通过进一步扩大开放,特别是扩大金融开放,吸引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大量国际投资。这说明,中国可以利用自身的实力和优势,反向塑造中国与包括美欧在内的外部环境之间的利益关系。其次,是议题塑造。中国所推动的“一带一路”倡议,反向塑造出了七国集团的“重建更美好世界”(Build Back Better World)计划、欧盟的“全球门户”基础设施计划。中国积极地向第三世界提供新冠疫苗援助和出口,反向促使美欧在新冠疫苗问题上更加积极地向第三世界给予更大的帮助、更大规模的出口。中国所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反向使美欧等国暂时隐藏或压制“本国优先”理念。这都反映出,中国能够通过议题塑造,反向影响外部环境。第三,是规则塑造。长期以来,美国在规则制订方面几乎拥有垄断性的优势,但最近几年美国在此方面已经越来越焦虑。奥巴马在任时就已声称,不能让中国制定贸易规则。拜登上台之后声称制订新的贸易准则不能允许中国参加,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Gina Raimondo)称“AI规则不能由中国制定”,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称美国必须领导所谓“自由网络”,新兴科技领域必须由美国制定标准和规范。这反过来证明,中国至少在部分领域已具备影响规则的制订乃至塑造规则的能力。第四,是观念塑造。长期以来,美欧在国际话语权方面几乎占据垄断性优势,定义了所谓民主的标准和经济模式。但是,中国的崛起在观念层面反过来影响和塑造了外部世界的认知。例如,欧洲普遍不认可中国的经济模式,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此观念正发生改变。德国总理默克尔就表示,“中国经济的份额在从1990年至2020年的30年内从1.7%上升到16.3%。2007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德国。……我必须承认,中国在经济上取得了成功。”^①越来越多的欧洲政治家认识到中国经济模式有可取之处,因此能够看到,近年美欧的国家经济干预主义强势崛起。

结 语

2021年1月29日,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罕见地表示,他希望中美关系能够“重启”。^②可见,稳定的中美关系不止有利于中美两国人民,也有利于整个世界。对于中国而言,需要认识到中美关系已不可逆地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

^① Angela Merkel. “Transcript ‘Europe is No Longer at the Centre of World Events’”, 2020-1-16, <https://www.ft.com/content/00f9135c-3840-11ea-a6d3-9a26f8c3cba4>, 访问日期: 2020-02-23.

^② Michelle Nichols. “U. N. Chief Guterres Hopes for ‘Reset’ in U. S. -China Relations”, 2021-01-29,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usa-china-un-idUSKBN29X204>, 访问日期: 2021-02-01.

段。中国乃至其他国家,都不得不为此做好长期的物质和精神准备。中国在应对中美博弈时,除需做好自己的事情外,也需对美国的内外政策走向进行深入研究,还需研究和分析以欧洲为代表的第三方对中美博弈的政策。拜登政府上台后美欧对华政策的联动,站在中国角度看,大有黑云压城之势。但站在全球以及更长的时间维度看,大可淡然处之。如吴心伯所言“对于拜登政府积极动员盟友来建立对华统一战线,我们要重视,但也不必大惊小怪。”^①对于未来的全球秩序,如英国华威大学教授、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肖恩·布雷斯林(Shaun Breslin)所言,“全球秩序不可能是由中美两个固定的集团联盟组成的两极体系”,未来的世界是“分化”而非“极化”。^②未来的全球秩序和中欧关系,依然给中国孕育着大量的发展机遇。如果纵观全局以及长远趋势,就能保持足够的战略定力,透过短期事件的迷雾看清前进的方向。因此,随着中美关系的逆转以及博弈的长期化,我们探讨以欧洲为代表的第三方所扮演的角色及其政策,不仅需关注短期变量,更需看长远趋势。我们要以十足的战略定力和战略耐力,把握中国前进的航向。

责任编辑:郑春荣

^① 朱敏洁《吴心伯:现在看中美关系,颇有一种世道变了的感觉》,2021-04-28, https://m.thepaper.cn/baijiahao_12442300, 访问日期:2021-06-30.

^② Shaun Breslin, “Divided but Not Poles Apart: Europe, the US and the Rise of China”, *Asian Perspectives*, Vol. 45, No. 1, 2021, pp. 177-190, here p. 177.

reflektiert das neueste Denken der EU über wirtschaftliche Abhängigkeit, Multilateralismus und strategische Partnerschaften.

**Eine Untersuchung zur Wissenschaftsdiplomatie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Politik gegenüber China
Zheng Hua/Zhang Chengxin**

Die sich abzeichnende wissenschaftlich-technologische Revolution erhöht die Bedeutung der Wissenschaftsdiplomatie, die in den Fokus aller Länder gerückt ist. Die Wissenschaftsdiplomatie verbindet die beiden Bereiche der Wissenschaft und Diplomatie, fördert die Entwicklung von Wissenschaft und Technologie und dient der Verwirklichung außenpolitischer Ziele. Die EU ist eine globale Wissenschafts- und Technologiemacht. Der Beitrag untersucht den Entwicklungsprozess der EU-Wissenschaftsdiplomatie seit dem Zweiten Weltkrieg, analysiert die strategischen Ziele und Mittel der EU und erörtert ihre praktischen Merkmale. Die Untersuchung zeigt, dass die EU ihre Strategie der Wissenschaftsdiplomatie entwickelt und eine Vielzahl von Instrumenten geschaffen hat. China ist das Hauptziel der EU-Wissenschaftsdiplomatie. Die wissenschaftlich-technologische Zusammenarbeit dient den Interessen beider Seiten. Angesichts der zunehmenden technologischen Rivalität zwischen den USA und China und der Komplexität der China-Politik der EU werden die bilateralen Beziehungen zwischen China und der EU im Bereich der Wissenschaft und Technologie verstärkt von Zusammenarbeit einerseits und Konkurrenz andererseits gekennzeichnet.

**Europas Rolle, Achse und Variable im Spiel zwischen China
und den USA in der Zeit der Biden-Administration
Gu Qiang/He Liqiang**

Nachdem die Trump-Administration eine Reihe von chinafeindlichen Maßnahmen ergriffen hatte, sind die Beziehungen zwischen China und den USA unumkehrbar in eine neue historische Phase eingetreten. Auch unter der Biden-Administration wird sich diese Entwicklung kaum ändern. Für China gilt es, im Spiel mit den USA in der Zeit der Biden-Administration nicht nur die politische Reaktion der USA im Blick zu behalten, sondern auch die Rolle und die politischen Entscheidungen der dritten Partei (insbesondere Europas) zu berücksichtigen. In der Amtszeit der Biden-Administration wird die Bedeutung Europas im Prozess des chinesisches-amerikanischen Spiels noch deutlicher werden. Was die gegenwärtige Situation angeht, kommt auf Europa nicht nur die Rolle des „Schachbretts“ im chinesisch-amerikanischen Spiel

zu, sondern auch die Rolle des „Schachspielers“, der eine beträchtliche Initiative hat und sein eigenes Schicksal so weit wie möglich unter Kontrolle behält. Die politische Achse Europas angesichts des Spiels lässt sich wie folgt zusammenfassen: Die Aufrechterhaltung der strategischen Autonomie ist das zentrale politische Ziel, die Aufrechterhaltung der europäischen Einheit die politische Grundlage und der „hybride Ansatz“ das politische Mittel. Der Amtsantritt der Biden-Administration wird für eine gewisse Zeit dazu führen, dass Europa sich auf chinesische wie amerikanische Politik auswirkt und somit zur kurz- und mittelfristigen Variable wird. Dies spiegelt sich in drei Aspekten wider: Europas Fähigkeit, die strategische Autonomie aufrechtzuerhalten und umzusetzen; Bidens Fähigkeit, die Beziehungen zwischen den USA und Europa zu koordinieren und schließlich Chinas Fähigkeit und Methoden, das äußere Umfeld umgekehrt zu gestalten.

Praktiken und Herausforderungen der nachhaltigen Entwicklung in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Eine Analyse aus der Perspektive der Klimaneutralität

Yang Chengyu

Als Reaktion auf den globalen Klimawandel hat die EU schon früh klimaneutrale Ziele formuliert und die nachhaltige Wirtschaft im Einklang mit der Politikgestaltung, dem technologischen Fortschritt, dem industriellen Strukturwandel, der gesellschaftlichen Transformation sowie der ideologischen Narrativbildung systematisch entwickelt, um Wettbewerbsvorteile zu erzielen. Die Analyse der nachhaltigen Entwicklung in der EU zeigt, dass die EU seit Jahren die rechtlichen und politischen Schutzmaßnahmen verstärkt, die Ziele nachhaltiger Entwicklung setzt, Marktregeln festlegt, das Verhalten von Unternehmen reguliert, eine Reihe von Übergangsziele und Entwicklungsplänen vorlegt und eine Vorreiterrolle in der internationalen Klimapolitik spielt. Außerdem hat die EU sich auf die Unterstützung nachhaltiger technologischer Innovationen konzentriert, indem sie ein breites Spektrum von Forschungs- und Entwicklungsmechanismen etabliert und erhebliche öffentliche Mittel zur Erneuerung nachhaltiger Technologien investiert hat. Die EU hat auch eine selbstversorgende nachhaltige Wertschöpfungskette geschaffen, innerhalb der jede einzelne Aktivität in den Prozessen miteinander verbindet, um schrittweise ein nachhaltiges Ökosystem für die Zukunft zu bilden. Darüber hinaus hat sie große Synergien zwischen den Finanzen und Soft Power erzielt, um eine nachhaltige Nachfrage nach der Entwicklung der nachhaltigen Wirtschaft in der gesamten Gesellschaft zu schaffen. Trotz zahlreicher Widerstände profitiert die EU davon, dass sie sehr früh mit der Entwicklung der nachhaltigen Wirtschaft begonnen hat, die systematisch strukturiert ist und einen großen strategischen Spielraum hat. Deswegen kann sie den Schwierigkeiten und Herausforderungen